

新媒体话语研究的方法自觉与理论推进

——《语言学视野下的新媒体话语研究》读后

王轿成¹⁾

1) 中国传媒大学, 联系邮箱 2272232698@qq.com

摘要: 新媒体话语是当代媒介生态催生的复合性交际实践, 其生成机制与功能面向深受平台逻辑、算法分发与多模态资源的共同影响。徐赳赳所著《语言学视野下的新媒体话语研究》以网络聊天语料为经验基础, 以明确的方法论自觉为逻辑前提, 从词法、句法及篇章三个维度对新媒体话语展开系统分析, 在中国语言学语境中推动了相关研究的范式转换。该著重构了语体格局, 将网络话语界定为兼具口语与书面语属性却独立于任何一方的“第三语体”; 在语言生活层面将“失范焦虑”转化为对媒介技术条件下语言选择行为的机制解释; 在多模态层面揭示了文字、图像、贴图、转帖及标点符号等多重资源协同参与意义生成的复合趋势; 在身份建构层面将数字身份从既有的社会属性认定推进为话语层面的动态建构与协商过程; 在语言治理层面阐明了新媒体话语研究有效介入舆情研判、教学改革等现实应用领域的可能性与路径。该著的核心启示在于, 新媒体话语研究不能囿于语言本体内部的封闭描述, 理应在语言事实与公共应用的双重面向之间确立自身不可替代的学术坐标。

关键词: 新媒体话语, 第三语体, 语言生活, 多模态, 身份建构, 语言治理

1 引言

在平台化、移动化、算法化与智能化交互驱动的当代媒介生态中, 新媒体超越了信息扩散渠道的功能定位, 进而演变为深度介入语言生产、意义建构、身份展演及社会协商过程的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这一基础设施的结构性变革, 为语言实践提供了全新的栖身之地与运作条件。相应地, 语言实践嵌入即时通讯、社交互动、评论参与、图文流转及人机协作等多元交际场域, 呈现出高度情境化、多媒介化与交互性的复合性特征。如此一来, 语言实践的变化传导至语言符号系统本身, 使得语言符号的生成规则、扩散轨迹、接收模态及社会效用, 在平台逻辑的结构性支配、算法分发的选择性中介以及多模态资源的协同配置下发生深层质变。需要指出的是, 这种质变触及到话语生产的主体性结构、交往行为的秩序化机制以及意义协商的权力博弈格局, 从而集中体现在新媒体话语的生成方式、组织逻辑与社会功能。基于此, 新媒体话语研究有必要超越对表层现象的描述性把握, 转而立足于数字交往的整体生态, 对话语的生成机制、秩序逻辑与社会功能展开系统性、批判性的理论审视, 从而更好地回应媒介化社会背景下语言研究范式转变的迫切要求。

新媒体话语以其高度动态性、技术渗透性与社会嵌入性对既有语言分析范式构成了显著挑战。有鉴于此, 学界日益呼吁一种既能根植于自然语料, 又能在语言形式刻画与社会文化阐释之间建立有效关联的研究进路。徐赳赳所著《语言学视野下的新媒体话语研究》正是回应这一学术呼求的系统性成果^[1]。该著区别于以往的网络流行语辑、经验性随笔或个案式描述, 其以系统性语料为经验基础, 以明确的方法论自觉为导引, 从词法、句法及篇章三个维度对新媒体话语展开分层解析, 进而在中国语言学语境中促成了相关研究从材料累积到理论建构、从现象勾勒到机制生成的范式跃迁。由此可见, 该

著的研究取向，恰好回应了当前学界关于社交媒体话语研究亟须从议题零散化走向方法系统化的学术共识^[2]。

进一步来看，该著追问语言的存在形态、组织结构及其社会功能在新媒体技术条件下经历的根本性转变。显然，这一追问在当下数智语境中更显现实迫切性。人工智能对传播实践的深度介入，使新媒体话语的生成机制超出了个体在线表达的范畴。平台架构对表达形式加以隐性规约，算法机制对信息流向进行选择放大，语言模型也参与到话语生成之中，多重维度的交互由此展开。这样看来，尽管徐著主要以QQ等文本型网络聊天语料为经验素材，但其问题意识并未因媒介技术的高速迭代而削弱，反而在人工智能深度嵌入传播生态的当下语境中，获得了更为丰厚的阐释空间。该著尝试揭示新媒体话语的基础性语法，这或许也是理解当下短视频、直播、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及多模态平台语言时仍须回溯的分析原点。与此同时，近年来围绕数字中文建设与教育数字化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举措，同样反映出国家层面对语言资源、多模态语料、语言技术及治理应用的战略性重视，这些都为该著的重新定位提供了更为宏阔的制度语境和时代参照。

2 方法奠基：从经验直觉到方法自觉

反思国内新媒体语言研究的学术演进，一个长期存在的症结就是研究对象前沿性与研究方法自觉性之间的失衡。这种失衡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中包括偏重材料累积而忽视概念界定、侧重直观判断而轻视证据链建构，以及在表层现象描写与深层解释之间缺乏有效的理论衔接。相较而言，徐著在开篇就把方法论问题置于突出位置，这不仅体现了对经验观察的审慎，更反映了其对研究结论学理根基的深层追求。正是这种方法论上的前置自觉，使全书有效规避了网络语言研究中常见的印象式评论与经验性泛论，并以此确立了其独特的学术价值。

就展开方式而言，该著并未直接进入语料分析，而是在系统铺陈方法论基础之后才展开对语言事实的全面考察。具体而言，书中不仅对“方法论”与“研究方法”这两个在汉语学术话语中常被混用的概念进行了厘定，还系统梳理了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与诠释主义等社会科学方法传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话语研究的方法定位、哲学假设、探究逻辑与操作程序。对于这样一部以新媒体话语为考察对象的学术著作而言，这种方法论前置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附设，而是全书论证体系的关键支撑。

由此可见，徐著既是一部基于丰富语料的语言事实研究，更是一部贯穿方法自觉的理论探索之作，其对当下新媒体话语研究的重要启发，在于构建了一种兼顾描写、比较与解释的多维研究范式，从而为后续研究奠定了深厚的方法论基础。

3 语体重构：从二元对立到“第三语体”

从二元对立到“第三语体”的经验确证，构成了该著在语体研究层面的核心贡献。经典语体学说总是建立在口语与书面语二元对立的框架之上^[3]，即便有研究专门对“文体”与“语体”作了更为精细的区分，但其基本预设还是把口语与书面语视为语体中最为基本的两种类型。然而，新媒体交际的兴起打破了这一静态划分。数字媒介中的语言表达既保留了书写的可视性、可编辑性与可留痕性，又承载了会话的即时性、互动性与高度情境依赖性。徐著通过对网络语言、口语及书面语的系统比较，将网络话语从模糊的中间地带提升为一种兼具口语与书面语部分特性的“第三语体”。

该著最具统摄性的理论判断，莫过于将新媒体话语的核心特征概括为“口语与书面语融合”。这一判断的学理分量，既源于其对数字交际表层特征的精准把握，更得益于主谓句与非主谓句的分布差异、小句长度的量化比较、标点符号的功能分析等多维实证数据的支撑，从而使该判断获得了可验证的经验基础。换言之，徐著将新媒体话语视

为一种在媒介技术条件下生成的混合性语体，它既不是“口语书面化”，也不等同于“书面语口语化”，其兼具口语与书面语的若干属性却不从属于任何一方。

徐著不仅拓展了现代汉语语体研究的对象边界，更为根本的是，其重新定义了语体形成的理据基础。新媒体话语之所以区别于口语与书面语，主要是因为平台场景的交互设定、交流节奏的时间结构、技术接口的功能约束以及受众的认知导向等多重因素共同塑造了其语法与语用选择。以新媒体话语的若干语言特征为例，非主谓句比例偏高这一现象，不宜简单归因为省略或结构残缺，而应理解为即时交互与语境高度共享条件下经济化表达的必然产物；小句平均长度趋近口语，并不意味着等同于日常会话，而是反映出其在信息传递效率与情感同步需求之间的动态平衡；标点符号的情态化与表情化趋势，则更为直接地体现出书写符号系统在数字语境中的再语法化过程。诸如此类的语言事实表明，传统的语体机制并没有失效，而是新媒介条件下的语体生成机制发生了结构性重组。

当前社交媒体话语研究开始关注数字语类、平台交互与主流媒体话语之间的复杂关联，这意味着语体研究正从静态类型划分转向动态媒介化分析。从这一学术转向来看，徐著的独特价值在于较早且系统地将这一理论预设落实到了可观察和可量化的语言事实层面。该著以详实数据证明，新媒体话语绝非传统语体系统中的边缘特例，而是数字时代汉语表达系统重新分层与整合的典型表征，这为后续的语体研究提供了富有启发的分析思路。

4 语言生活：从“失范焦虑”到机制解释

从“失范焦虑”到“机制解释”的演进，折射出语言生活研究在方法论层面的重要转型。近年来，该领域逐渐形成一种具有范式意义的共识，即语言研究的核心关切不在于对语言形式进行规范与否的外部评判，而在于观察语言如何在真实的社会运行中被实际应用、动态协商与情境化调适。依照这一视角，网络语言等新媒体话语现象不宜被置于规范与不规范的对立框架中加以审视，更应将其视作当代真实语言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这一方向上，徐著做出了值得重视的推进工作。书中围绕高频词、错字错词、网络词语、语码转换、方言词及词类活用等议题展开的分析，表面上是处理不同层级的词法现象，本质上则描绘了数字时代语言生活的微观生态图景。透过这些语言事实，可以观察到哪些词汇聚集群体的关注焦点，哪些错误在具体交际中获得容忍，哪些表达因趣味驱动、身份标识或情境适配而得以扩散流传，哪些语言资源因平台交互而重新激活。其中，关于错字错词与修补机制的讨论尤为深入。传统规范视角往往将网络书写中的错字错词视为语言能力衰退或文字素养下降的症候性表现，该著则采取了不同的解释路径，转而关注以下理论议题：为何在网聊中大量错误不被主动修补？为何说写者与接收者能够容忍这些偏误持续存在？^[4]作者由此发现，新媒体交际中的修补频率显著低于面对面交谈，其深层原因并非使用者的“粗心”或语言能力的“退化”，而在于网络交际奉行理解优先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只要不影响核心意义的有效传递，交际参与者在认知负荷与表达效率之间倾向于选择较为经济的处理方式，从而减少额外的修正投入。这一发现将表面上看似失范的语言现象还原为特定媒介条件下主体理性选择的结果，从而有力推动了网络语言研究从道德化批评向机制性解释的学理转向。

这种研究取向与语言生活研究长期倡导的现实关怀形成了内在呼应。语言生活研究核心理念是将语言理解为一种动态嵌入具体情境的社会实践，而非静止孤立、可被外在标准单向裁定的抽象对象^[5]。徐著的重要性正在于将数字媒介中的语言实践切实纳入语言生活的真实运作场域，由此呈现出网络语言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规范之敌，而是语言

系统在新型交际环境中实现自我调节与自我更新的产物。这一定位在语言事实层面已获得广泛印证，如大量网络词语逐渐进入主流媒体乃至权威词典的收录范围。这充分说明数字交际并非游离于主流语言体系之外的封闭空间，而是当代汉语保持活力与弹性的重要来源之一。

将徐著的研究取向置于当前政策语境中加以审视，其学术意义与时代价值更加鲜明。新近发布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提高全民语言文化素养、健全语言文字规范标准体系、建设新型国家语料库并加强网络空间语言文字规范引导等多项目标。由此可见，国家层面的语言规划与建设思路正从传统的单向度规范文本供给，逐步走向语料资源系统建设、数据支撑平台搭建与场景化理解深化的综合路径。徐著立足于网络聊天语料，试图从真实的语言生活实践出发归纳语言使用的内在规律，这一研究取向与国家当前语言战略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不仅说明这项研究具有现实针对性，也意味着其研究结论或许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5 多模态拓展：从文字中心到复合表意

新媒体交际的本质是多模态的^[6]，徐著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本质特征，进而将分析视野从单一的文字符号拓展至图像、标点符号等多种模态资源的协同表意。需要指出的是，社交媒体话语因其互动群体的异质性、主题风格的多元性以及模态形式的多样性，业已突破传统话语分析以单模态文本为基本单位的考察边界。与此相呼应，多模态已跃升为当前语言研究、资源建设与技术发展的共同前沿。2025年发布的《关于加强数字中文建设推进语言文字信息化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建设大规模多模态优质语言资源的任务，这一政策清晰表明，多模态问题已从边缘议题上升为核心关切。尽管徐著主要以文字型网络聊天语料为经验素材，但其关于贴图、转帖、符号表意及互文阅读的讨论，已为新媒体话语从单模态文本研究迈向多模态意义考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接口与实践参考。

如果说早期的网络语言研究多集中于新词新义的归纳与句法变异的描写，那么徐著的前瞻性就体现在敏锐地洞察到新媒体话语并非纯粹的语言文字现象，而是一种涵盖多重符号资源协同运作的复合性意义生产过程。其中，对转帖行为的分析尤能彰显作者对新媒体话语中互文机制的精准把握。转帖在网络交际中并不是信息搬运的简单操作，而是一种快捷的话语引用策略、立场的间接调用手段以及语境的有效扩展方式。它将外部文本嵌入当前对话进程，使交际活动超越单一话轮的线性推进模式，进而编织出更为复杂的互文关系网络。类似地，贴图的使用同样超越文字表达的辅助性附属地位，独立承担起情绪传递、语气补足、态度暗示与关系调节等多重语用功能。此外，该著对标点符号功能的重新定义同样颇具深意。在网聊中，“???”不再是简单的疑问标记，而是承载了强烈质疑、困惑等超切分特征的表意单元；“/滑稽”、“/doge”等由符号构成的“标签”更是发展出类似语气词和情态副词的语法功能。由此可见，徐著对新媒体话语的考察从纯文字层面提升至多模态资源整合、互文性建构与意义生成机制综合阐释的新高度。

更为可贵的是，该著对多模态现象的处理并未停留在表象层面的附会式解读上，而是始终坚持将符号形式与交际功能紧密关联。其分析焦点从网图、表情与特殊符号的表征趣味，转向这些符号资源如何进入话语组织结构并实质性参与意义协商的内在机制。正是这种功能导向的分析路径，使该著对当下的多模态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当前，短视频、直播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已将多模态表达推向高度复杂的形态，视觉影像、声音信号、文字字幕、动态动作、算法推荐与用户再创作共同嵌合为崭新的传播结构。在这种传播环境中，多模态研究若缺少对具体交际功能的细致分析，便极易沦为各

要素的简单罗列与平面化堆叠，难以形成有解释力的结论。在这一层面，徐著的核心启示在于，多模态并不只是各符号系统之间的简单叠加，而是围绕特定交际任务所形成的有机关联与功能协同，其深层逻辑的把握仍须回到语言使用的社会实践之中。

6 身份建构：从社会属性到话语过程

当前，身份、立场、平台互动与公共传播之间的复杂关联正逐渐成为社交媒体话语研究的主要议题。以此反观徐著，其对匿名场域中自我呈现与他者想象的关注，揭示了数字化身份建构的基本机制。这表明，身份并非新媒体话语的附属议题，而是新媒体交际得以成立的内在条件，其作用贯穿于话语生产、意义协商与社会关系建构的始终。

徐著对身份问题的系统讨论，自然也应视为其理论贡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语言学与语用学中，身份建构是话语实践的核心功能之一^[7]。新媒体的匿名性与去身体化特征，为身份的展演与协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徐著对“身份确认”的探讨，深入剖析了语言如何在“无人”的虚拟空间中成为构建自我与他者形象的首要乃至唯一资源。网络空间通常被视为匿名化、流动性、去身体化的交往场域，但作者敏锐地观察到，即便在缺乏面对面线索的网络聊天环境中，交际参与者仍然对对方的身份信息表现出持续而强烈的探询兴趣，尤其聚焦在性别归属、职业背景、地域分布与网名选择等维度。这一观察看似朴素，实则触及到新媒体社会语言学中的核心命题，即在新的媒介技术条件下，身份并未被技术环境所消解，反而以新的方式被重新整合到话语互动的基本架构之中。

进一步来看，徐著的理论价值不仅在于从经验层面确认了网络交际中普遍存在的身份探询行为，更在于其隐含地推动了身份研究视角的深层转换。传统研究通常将身份预设 of 交际行为发生之前就已固定的社会属性，语言仅被视为表达这些属性的中性工具；而在新媒体环境中，身份越来越显现为互动过程中被持续建构、被动态索引、被情境化协商的产物。网名的选择策略、语码的转换模式、词汇的偏好倾向、提问的切入方式、回应的组织策略、回帖的习惯路径乃至表情与贴图的使用风格，都能成为身份在话语层面被识别与解读的多重索引。换言之，身份不仅仅是“某人是谁”的静态定位，更关乎如何通过话语实践被描述为“是谁”、被识别为“某种人”的动态过程。

在当前的数智语境中，徐著关于身份的认识获得进一步的拓展与深化。随着人工智能深度参与信息内容的生产与分发，除了话语发出者的使用者身份，身份问题还延伸至话语来源的类型归属，包括真人表达、机构发布还是模型生成等不同类别，而这又会进一步牵涉到话语背后所承载的立场归属与责任归属问题。这就意味着，徐著关于身份建构的阐释不单是社会语言学内部的理论问题，而是与媒介伦理、平台治理、人机交互等更广泛的学术议题形成了关联。由此可见，徐著对身份问题的探讨并没有停留在社会属性的静态描述上，而是深入到数字时代主体性如何被话语呈现、如何被平台规约这一更为根本的理论层面，由此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富有生长力的探索空间。

7 语言治理：从语言事实到公共应用

从语言事实到公共应用的延伸，正是徐著在语言规划与治理层面的独特贡献。既往的新媒体话语研究，尤其是围绕网络语言的讨论，总是徘徊于是否污染汉语纯洁性、是否应该严格禁止等非此即彼的评判之中，其判断依据多诉诸语言规范的情感诉求而非经验事实。与以往研究不同，徐著更加注重从真实语用出发考察网络语言的生成机制、运作方式与接受动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治理与引导路径。需要明确的是，语言治理不应停留在对“不合规”的简单排斥与外部规约上，而应立足于语言事实、媒介运作机制及使用者交际策略的系统把握。可以说，只有真正理解了语言现象，治理才能有的放

矢；而要真正理解语言现象，就必须回到真实的语料中去，从细致的分析中寻找依据。从这个意义上看，徐著不仅是一部新媒体话语研究的学术专著，同时也是一部具有语言规划与治理启示价值的理论成果。

在徐著看来，语言治理不能仅停留在规范条文的制定上，而是需要回应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公共传播中的话语秩序，二是教育实践中的语言能力培养。徐著最贴近现实的一面就是将理论探讨延伸至舆情研判与教学应用。这一延伸充分表明，作者并没有把语言学视为远离社会现实的静观之学，而是将其定位为能够介入社会治理、公共传播与教育改革的知识生产领域，从而赋予语言学研究以明确的社会责任。

在舆情研判层面，作者强调应重点关注高频词及意见领袖的话语特征。高频词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分析价值，不仅在于其能够反映聊天主题的分布，更因其可以揭示群体的关注焦点、情绪重心与立场倾向；活跃成员及其表达方式之所以值得深入考察，则在于网络传播并非完全均质的结构，少数活跃节点常在议题扩散与意见凝聚过程中发挥枢纽作用。从方法论角度来看，此种思路将语言学的频率分析技术、语义聚类方法与互动结构观察同舆论生成机制有机结合，实际为网络舆情分析提供了一条具有学科自觉的语言学路径。它深刻表明，数据治理并不必然等同于抽象的算法模型与纯粹的技术监测手段，语言本身就是理解公共情绪与社会关注的重要认知入口，语言学的概念工具与分析方法在此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解释潜力。

在语言教学层面，徐著主张网络话语应进入教学视野，这一点同样具有启发意义。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并非主张以网络用语取代规范的书面语表达，而是基于新媒体已广泛嵌入日常生活与传播实践这一不可逆的社会事实，提出语言教学不应回避这一语言现实，而应通过比较分析、解释框架与语体辨析训练，培养学生对不同语体、不同场景、不同表达资源的选择意识与运用能力。徐著所倡导的核心理念，并非网络语言的课堂合法化，而是数字时代语言教育的现实化与情境化，这一立场为应对当下语言教学面临的新挑战提供了富有建设性的思路。

8 余论

综观全书，该著在语体、语言生活、多模态、身份建构与语言治理等维度上均作出了系统性推进，形成了从形式描写到功能解释、从语言本体到社会应用的理论闭环。

更为重要的是，该著为一个正在快速演进的技术时代提供了语言学视角下的基础性坐标。当前，国家层面正在持续推进数字中文建设、新型国家语料库建设、多模态语言资源建设以及网络空间语言文字规范引导等多项战略任务，学界也在不断推动社交媒体话语研究向平台化、多模态化、治理化与人机协同化方向深入拓展。在这一复合性学术语境中，徐著所坚守的真实语料基础、结构分析路径、社会解释取向与现实应用指向，共同构成了一条稳健而富有远见的研究路径。它深刻提示我们，新媒体话语研究的核心关切不在于对新词热梗的即时追踪与表层记录，而在于透过纷繁的语言变化，把握数字时代语言如何重新组织社会关系、重塑身份认同与重构公共生活秩序等根本性问题。

从学术前沿角度来看，徐著仍有一定的拓展空间。第一，其主要语料以QQ平台等准同步文本交际为核心来源，因而对短视频、直播、弹幕以及沉浸式平台场景下的动态多模态互动尚未展开充分考察。第二，尽管其已敏锐触及图像、转帖、贴图与标点符号的多重意义功能，但在方法论层面尚未构建更为系统的多模态分析框架，这一领域仍有待后续研究的理论填充与方法完善。第三，在人工智能大规模介入内容生产的当下，新媒体话语的主体结构、责任归属与真实性判定均已发生质的变化，这些问题显然超出了该著写作之时的直接讨论范围。第四，平台算法如何影响特定语言形式的可见性、传播

效能与规范化程度，也是当前亟须补充的重要研究维度。然而应当承认，这些未尽之处并不构成对该著学术价值的否定，反而从其反面彰显了其研究框架所具有的理论延展力与发展潜力。该著业已搭建起若干关键的分析支点，包括融合语体的功能定位、语言生活的生态视角、话轮秩序的组织逻辑、身份协商的动态机制、互文机制的运作方式以及治理应用的实践路径。后续研究无论聚焦直播话语、短视频评论、政务平台传播，还是面向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时代的人机共构文本，都可沿此框架继续推进与深化。

总而言之，徐著是理解中国新媒体语言生态的一部重要著作，其最根本的启示在于，真正具有理论解释力的新媒体话语研究，既不能脱离语言本体分析这一基本依托，也不能止步于语言本体内部的封闭描述；既要深入词法、句法与篇章结构的细密层面，也要面向平台社会运行、语言生活演变与治理实践需求所构成的广阔学术场域。正是在这种双重面向的张力之间，该著确立了自己不可替代的学术位置，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持续对话的起点与空间。

参考文献：

- [1] 徐赳赳.语言学视野下的新媒体话语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
- [2] 李战子,韩泽婷.近十年 CSSCI 期刊社交媒体话语研究现状及热点趋势分析[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25,48(5):102-111.
- [3] 尹洁.书面语与口语的源与流——文与言判 雅俗殊形[N].光明日报,2023-04-09,05版.
- [4] 徐赳赳.新媒体话语中错误-修补分析——以新语体 QQ 聊天为例[J].当代修辞学,2018,(02):55-62.
- [5] 李宇明.语言生活与语言生活研究[J].语言战略研究,2016,1(03):15-23.
- [6] 徐燕,冯德正.多模态语篇中的视觉元话语:以新媒体传播为例[J].外语学刊,2023,(02):27-33.
- [7] 陈新仁.语用身份:动态选择与话语建构[J].外语研究,2013,(04):27-32+112.